

裘錫圭學術文集

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裘錫圭學術文集

第四卷

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錄

納西象形文字	1
人民群眾是漢字的創造者和改革者	3
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	7
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	25
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	40
漢字的性質	49
《辭源》《辭海》注音商榷	59
《辭源》修訂本在注反切方面的一些問題	76
文字職務的分化	86
談談漢字整理工作中可以參考的某些歷史經驗	96
研究漢字切忌為感情所支配	101
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103
四十年來文字學研究的回顧	149
釋詞兩則	162
一、釋“拉雜”	162
二、釋“涉獵”	164
談談《同源字典》	169
再談古文字中的“去”字	188
從純文字學角度看簡化字	190
在紀念《漢字簡化方案》公佈 35 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194
讀古書要注意字的古義	196
秦漢時代的字體	205
大學生應該注意培養正確使用漢語漢字的能力	230
一句至少被誤解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常用的話——“予取予求”	235

究竟是不是文字

- 談談我國新石器時代使用的符號…………… 237
- 讀《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 239
- 不要以不誤爲誤
- 語文瑣議之一…………… 243
- 積極慎重地進行現代漢語規範化建設…………… 249
- 貝、錢、幣
- 雜談古代貨幣制度對語言文字的影響…………… 253
- 研究古代文化應該有訓詁常識…………… 255
- 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與沈培合著)…………… 259
- 從方塊漢字能否廢除說到外來詞的譯法…………… 296
- 談談“異形詞”這個術語…………… 298
- 用出土文字資料檢驗清儒在語文學方面的一些具體見解…………… 304
- 談談進行古代語文的學習和研究的一些經驗教訓
- 基礎要扎實些,考慮要全面些…………… 310
- 關於《規範字表》的一些想法…………… 319
- 《論衡》札記…………… 320
- 附:關於《校釋》、《集解》二書的錯誤…………… 340
- 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 347
- 談談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漢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 378
- 讀書札記九則…………… 389
- 一、“祭禽”解…………… 389
- 二、說“食”…………… 390
- 三、說“索我於枯魚之肆”…………… 391
- 四、說“宦皇帝”…………… 392
- 五、說“遇負杖入保者息”…………… 393
- 六、說“河海不擇細流”…………… 394
- 七、“登立爲帝,執道尚之”解…………… 395
- 八、《洛誥》“其作周匹休……”新解…………… 396
- 九、《戰國策》“觸讐說趙太后”章中的錯字…………… 398

斗卮和題湊	400
閱讀古籍要重視考古資料	404
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校勘《尚書》的一個重要發現	412
說“揜函”	
——兼釋甲骨文“櫓”字	418
《墨經》“佢”“謂”“廉”“令”四條校釋	423
《史記·殷本紀》注譯	430
四十年來發現的簡帛古籍對傳世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提要)	447
古文獻中讀爲“設”的“執”及其與“執”互訛之例	451
“地君之御”與“制地君”	461
簡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讀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重要根據	464
“東夏”解	469
讀書札記四則	475
一、“耆其股肱”之“耆”當訓“強”	475
二、《王兵》與《管子》互校一例	475
三、“秉時養人”之“秉”爲“並”之音近訛字	479
四、《韓非子》“行事”當與秦漢人所言“行事”同義	480
再談古文獻以“執”表“設”	484
附：讀書札記一則(郭永秉)	494
再談古書中與重文有關的誤文	496

納西象形文字

納西族是居住在我國雲南省西北部等地的一個兄弟民族。它曾經使用過兩種自造的文字。一種是較後起的表音文字，有的學者音譯它的名稱為“哥巴字”。一種是歷史較久的、以形意符號為基礎的文字，^①納西人稱它作“木記號石記號”，這就是一般學者所說的“納西象形文字”。

“納西象形文字”並不是整個社會通用的文字。它只為少數“東巴”（巫師）所掌握，主要使用在記錄經典等宗教性的用途上。

這種文字的構造原則和古漢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下主要根據麗江納西族記錄經典的文字，舉例加以說明：

1. 符號字。如卍（“好”，以吉祥的符號表“好”意）×（“十”）+（“百”）等。
2. 象形字。如◉（“星”）𪛗（“鷄”）𪛗（“齒”）∧（“屋”）等。
3. 象事字。如𪛗（“播種”）𪛗（“抱”）𪛗（“飛”）等。
4. 表意字。如𪛗（“美”，以花朵表“美”意）𪛗（“行星”，O上加𪛗表行動意）等。

5. 假借字。納西文字中同音或音近假借的現象極多。例如𪛗本讀 meɿ，是“女陰”的象形字，經典中常常借表讀 meɿ 的一個助詞。𪛗本讀 puɿ，義為“蒿”，𪛗本讀 paɿ，義為“蛙”，這兩個字連在一起，可以借表“puɿ paɿ”一詞，義為“化育”。

6. 形聲字。形聲字數量很少，但可以分兩類。一類是在本字上加注聲符而成的。例如𪛗字義為“山崖”，∧是山崖的象形，因為“鷄”和“山崖”是同音詞，所以在“山崖”的象形字中加畫一個鷄頭以注明讀音。一類是由形符和聲符合成的。例如“小官”一詞通常借同音詞“蕨菜”的象形字𪛗來表示，但有時又加上一個端坐人形而寫做𪛗，就變成一個形符加聲符的形聲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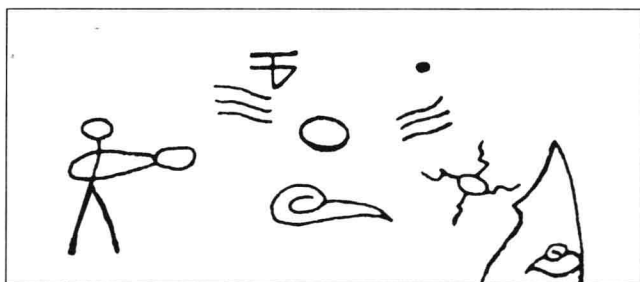
^① 這種文字創始的時代還不能完全確定，不過至遲也應在明代以前。可參看《麼些象形文字字典》序。解放前漢人稱“納西”為“麼些”，“麼些象形文字”就是“納西象形文字”。

納西文字的字形還不很固定,例如寫“鷄”字,可以把整個鷄畫出來,也可以只畫一個鷄頭。沒有本字的詞所用的假借字也不是很固定的。

此外,還存在一個字用作兩個以上聲音不同的詞的形意符號的現象。例如⊕字讀 biɬ 當“太陽”講,讀 niɬ 當“白天”講,讀 soɬ 當“早”講。

雖然“納西象形文字”已經大量地、固定地和語言中的詞結合起來,並且表音的成分也已經相當發展;但是,它仍然是一種很不成熟的文字。在使用這種文字的時候,通常並不完整地記錄語言。例如在下面所引的那段經典文字裏,“右邊”“左邊”等意思不是用文字,而是由風和蛋的相對位置表示出來的。至於“吹”“蕩漾”“撞”等意思就更需要讀者自己從“畫面”上去體會出來了。就是在把語言記錄得比較完整的例子裏,也往往很難完全把字一個個地分析開來。文字的形體常常根據上下文而改變。例如“九”字通常作 卍,但在說到“九對蛋”的時候,便畫九個蛋而作 𠄎。這一變體也可以看作“九”和“蛋”的合文。有時一個字只要稍微添加一些東西,就能代表很複雜的意思。例如 𠄎 是“樹”字,在樹下加上一只腳寫成 𠄎,就可以讀作“樹生脚會走路”。

附:“納西象形文字”簡介



這是從麗江納西族經典“人類的來歷”中摘出來的一段“文字”。●是“黑”字，卍是“白”的借音字。☉是“湖”字。根據納西經師的釋讀譯出的漢文如下：

“把這蛋拋在湖裏頭,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風蕩漾着湖水,湖水蕩漾着蛋,蛋撞在山崖上,便生出一個光華燦爛的東西來。”(引自傅懋勳《麗江麼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29頁)

原載《文字改革》1962年8期(署名土),又載《古代文史研究新探》(作為《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的附文),今據後者收入。

人民群眾是漢字的創造者和改革者

在我國歷史上，反動統治階級宣揚“倉頡作書”（書指文字）的神話，說漢字是由一個叫倉頡的“聖人”造出來的。他們還把文字看作自己的專利品，把人民群眾所寫的字斥為“俗字”“破體”，誣蔑人民群眾是漢字的破壞者。歷史事實證明，正是人民群眾創造並改進了漢字。反動統治階級的謊言和誣蔑必須徹底加以肅清。

倉頡造字說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世界上獨立形成的文字通常萌芽於原始社會，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到階級社會初期才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它們是人民群眾集體智慧的產物，決不是個別人所能創造出來的。漢字也是獨立形成的文字，它的創造者是人民群眾，而不是個別的人。古代有些比較進步的思想家已經多多少少看到了這一點。例如戰國末年的荀子就認為倉頡只是衆多的“好書者”中間的一個（見《荀子·解蔽》）。到了近代，懷疑倉頡造字說的人就更多了。

地下發現的實物資料，也宣告了倉頡造字說的破產。解放後，在西安半坡村發掘的仰韶文化遺址裏，發現過一些刻有記號的陶器殘片，那些記號跟商、周古文字裏的數字和某些簡單文字非常相似。此外在山東出土的龍山文化陶罐上也發現了和青銅器刻銘是一脈相承的象形文字。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都是我國原始社會時期的新石器文化。上述資料證明我國原始社會的勞動人民從西到東都在陸續創造文字，漢字決不是某一個“聖人”所製造出來的。魯迅在《門外文談》裏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更可以敷衍記事了。”這是符合文字產生的實際情況的。

但是，“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却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門外文談》）。進入階級社會以後，文字成為特權者進行統治的重要工具，勞動人民被剝奪了學文化的權利。他們為了掩蓋文字起源於民間的真相，極力宣揚“倉頡作書”的神話。他們先把倉頡說成黃帝的史官，後來又把他說成是遠古的“帝王”，甚至稱之為“倉聖”。他們為了使倉頡與衆不同，還宣揚“倉頡四目”的奇談怪論。這一切無非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想通過文字創造的神秘化，來提高文字的尊嚴性，從而使把持

文字的特權者也顯得更為尊嚴。舊社會裏提倡“敬惜字紙”，向人民灌輸文字神聖的觀念，也是同樣的用意。所以我們必須批判倉頡造字說，恢復人民群眾創造文字的歷史真面目。

人民群眾不但是漢字的創造者，而且是漢字的改革者。以漢字的衛道士面目出現的反動統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即所謂士大夫，則是阻礙漢字發展的保守派。

對漢字的保守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的鼻祖——孔子。孔子主張“正名”，認為事物名稱的涵義不應該有變化（實際上是要求事物都保持奴隸制全盛時代的老樣子）。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對文字也必須採取保守態度。《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曾說：“吾猶及史之闕（缺）文也，……今亡（無）矣夫。”據漢代經學家解釋，起先人們有不知該怎麼寫的字就空在那裏，“問諸故老”。到孔子的時候，所謂“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寫字不按“老規矩”。所以孔子有這樣的感慨（見《漢書·藝文志》等）。歷代“正統派”的士大夫大都繼承了孔子對漢字的保守思想。他們認為文字是聖賢傳下來的，是不能輕易變動的。實際上是以此來維護文字的尊嚴性，並且阻礙人民群眾掌握文字和改革文字。

人民群眾對待漢字的態度跟士大夫是截然不同的。對他們來說，文字只不過是書寫工具，他們所關心的是怎樣使漢字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讓它變得更便於使用。所以，只有人民群眾才能成為改革漢字的主力。

在漢字發展史上，篆書演變為隸書是最重大的一次改革，而隸書就是由人民群眾手頭的篆書草體發展而成的一種字體。“隸書”這個名稱就顯示了它是來自下層的。隸書就是徒隸之書的意思。當時的統治階級看不起這種字體，所以把它叫隸書。古書裏說秦始皇命程邈作隸書，把隸書看作個別人創造的字體，這是錯誤的。不過，秦始皇確實曾經命人對新興的隸書進行過統一整理工作，把它作為小篆的輔助字體加以推行。這是對漢字發展有重大意義的措施。

隸書比小篆好寫得多，到了漢代很快就取代小篆而成為主要字體。士大夫也開始使用這種他們本來極端看不起的徒隸之書了。在士大夫手裏，隸書逐漸形成一種有一定的“波勢”“挑法”的規整書體，後人叫做八分書。這種書體美觀倒是相當美觀，可是寫起來卻又很費事了。在東漢中後期，當士大夫相競用工整的八分書勒石刻碑的時候，民間日常應用的隸書在草書的影響下，已經在向一種更簡易的新書體演變。到魏晉時代，這種新書體，即楷書（指我們現在理解的楷書，不是隸書的楷法），就基本形成了。在篆書演變為隸書、楷書的過程裏，人民群眾起了主要的作用。

隸、楷擺脫了古文字象形原則的束縛，把漢字改造成由一些平直的筆劃所組成的符號，大大提高了書寫速度。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正統派”的士大夫雖然身受隸、楷之賜，却不承認由篆變隸是一個進步。相反地，他們還要給隸書加上種種罪名，什麼“變古”、“鄙俗”、“舛[chuǎn]駁”，等等，指責隸書破壞了聖賢造字的意思。宋、元以後，一些“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的士大夫，還玩弄“以篆入隸”的把戲，按照篆文的結構來寫楷書，把一些很普通的字寫成一般人認不得的怪字。有的人直接用小篆寫書。清代的江聲就是一個典型。他不但用小篆寫《尚書》，寫畢沅的《釋名疏證》，甚至用小篆開藥方！秦始皇推行隸書本來是一件好事，“正統派”的士大夫却把這也算作他的一條罪狀。例如受宋太宗之命校定《說文解字》的徐鉉，在《上〈說文〉表》裏說：“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訛僞日滋。”其實“便於末俗，人競師法”不正是隸書比篆書進步的明證嗎？

方塊漢字發展到楷書以後，字體基本上固定下來。此後，方塊漢字本身的改革主要表現在簡體字的出現上。人民群眾迫切需要簡體字，反動統治階級則力圖保持漢字的舊面貌，反對簡體字，雙方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

在舊社會裏，創造和使用簡體字的，主要是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刻字工人、民間藝人和店員、學徒這些人。他們大都是受壓迫的下層人民。在古代遺留下來的民間文書和宋元以來的小說、戲曲等通俗讀物的刻本裏，可以看到不少簡體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一直沿用到現代，並為我們的《漢字簡化方案》所吸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革命時期簡體字往往特別流行。太平天國就用了許多簡體字。有人統計，先後出現在太平天國公文經籍裏的簡體字有一百多個；同音代替，如以“付”代“副”等，也屢見不鮮。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簡體字在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軍民中非常流行。隨着全國解放，老解放區的簡體字流行到全國各地，被稱為“解放字”。我們現在所用的“擁護”“幹部”等字就是解放字。可見革命人民是十分歡迎簡體字的。

士大夫絕大部分是反對簡體字的。他們所排斥的“俗字”“破體”，主要就是楷書形成後出現的簡體字。除了封建政權以行政力量來排斥“俗字”“破體”以外，士大夫們還寫了很多正字法著作來跟“俗字”“破體”作鬥爭。早期正字法著作的態度一般還比較平實一些。例如唐代前期顏元孫的《干祿字書》認為俗體在“籍帳、文案、券契、藥方”中可以使用，並未完全加以排斥。隨着封建社會越來越腐朽，士大夫在正字法方面的主張也越來越保守。宋以後的正字法著作中，指斥俗字“不知

所从,無以下筆”、“過爲鄙淺”(見宋徐鉉《上〈說文〉表》)、“承襲鄙俚……斷不可從”(見清四庫全書館《辨正通俗文字》)一類的話,就多起來了。明清時代,科舉制度對字體的要求越來越嚴格,更助長了保守的“正體”的氣焰。清代最流行的一本正字法著作,龍啓瑞的《字學舉隅》,就是爲應試的士子而作的。一直到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年代,反對漢字改革的勢力仍然非常強大。1935年,國民黨反動分子戴季陶爲了反對簡體字,就扮演了“爲漢字請命”下跪的醜劇。國民黨反動派對當時共產黨所領導的拉丁化運動,更是用極其殘酷的手段進行強烈的反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勞動人民當家作了主人,漢字的歷史也揭開了新的一頁。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我們大力進行了文字改革工作。漢字的簡化和整理工作取得一定成績;人民群眾創造的大量簡體字,從受排斥歧視的“俗字”“破體”變成了正體。推廣普通話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工作都有了進展。我們正在爲實現毛主席指示的“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目標而努力!但是改革和反改革的鬥爭並沒有止息。妄圖在政治上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階級敵人,在文化上也必然要搞復辟。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曾經對文字改革工作大肆攻擊。他們反對漢字走拼音化道路,胡說《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是少數人關起門來搞的;還誣蔑漢字簡化“搞糟了”,要國務院撤回《漢字簡化方案》。劉少奇一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誣蔑《漢語拼音方案》採用拉丁字母是“奴才思想”,攻擊簡化漢字“將來是要吃大虧的”。這些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都已經在歷史的巨輪下被碾得粉碎。他們對文字改革工作的瘋狂叫囂,絲毫也沒有影響億萬人民改革漢字的決心。經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貫徹黨的十大精神,在批林整風運動的推動下,一定能夠積極而又穩步地把文字改革工作做得更好。

編按:

此文是在“批林批孔”的極左思潮支配下寫的。本文關於漢字形成問題的看法是錯誤的,作者後來的看法見本書所收的《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及《文字學概要》的相關章節。本文關於正體俗體的意見也是片面的。

原載《光明日報》1973年10月25日4版,今據以收入。

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 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

一、“遣冊”字體的特點

馬王堆一號漢墓所出的由三百十二枚竹簡組成的“遣冊”，對於研究漢字字體發展的歷史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以前發現過不少西漢時代的文字資料，但是西漢前期（指漢初至景帝時期）的隸書却很罕見。六十多年來，在我國西北部相當於漢代河西四郡和西域的地區，發現了大批漢簡。這是研究漢代隸書的極好資料。但是它們的時代再早也早不過武帝經營河西的年代。就目前所看到的西北漢簡來說，有明確紀年的時代最早的一簡，是敦煌附近發現的天漢三年簡。^① 天漢三年已經是武帝在位的第四十三年了。1961年，長沙沙子塘西漢前期墓出過一些寫有隸書的木封泥盒，但字跡不夠清晰，數量也少，對研究字體幫助不大。^② 西漢的石刻很稀少。時代較早的較重要的刻石——趙廿二年群臣上齶刻石和魯北陞刻石，都是小篆。有明確年代的最早的隸書刻石，是地節二年楊量買山記和五鳳二年刻石，都已經到了宣帝時代。^③ 西漢的漆器銘文，如果不算字數很少的零碎資料，也沒有早於武帝

① 《流沙墜簡》（以下簡稱“流”）卷二廩給類6。關於漢簡年代可參閱王明《簡與帛》（《考古通訊》1955年2期56頁）。居延漢簡中的所謂太初三年簡，乃是太初三年以後所書而追述到太初三年的往事，陳夢家《漢簡考述》已經指出（《考古學報》1963年1期85頁）。《新獲之敦煌漢簡》著錄的酒泉玉門都尉一簡，似為敦煌置郡以前物，可能為西北漢簡中年代最早之簡（夏鼐《考古學論文集》76頁），可惜簡文未記年份。

② 《長沙沙子塘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63年2期。封泥匣照片不清，摹本似亦不很精確。

③ 關於西漢石刻，看徐森玉《西漢石刻文字初探》，《文物》1964年5期。

時代的東西。^④西漢的印文和瓦當文字，基本上是小篆。已發現的西漢前期的陶文，絕大多數是打在陶器上的印文，主要也是小篆。西漢銅鏡銘文中時代較早的，如“見日之光”等銘，也都是小篆。西漢前期的銅器銘文倒是篆隸並用的，而且隸書還比小篆用得普遍。但是，由於西漢前期沒有年號，這些銘文的時代不是很明確，並且資料也比較零碎，所以一般都不大注意。總之，在馬王堆一號漢墓發現以前，我們對於西漢前期的隸書是極其缺乏知識的。

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絕對年代尚無定論，但是其時代早於武帝，則是一般所公認的。墓中所出的“遣冊”、竹筍和陶罐上的簽牌以及漆器上書寫的文字，都是隸書；並且字跡也大都很清楚。這就使我們對西漢前期的隸書第一次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

一般把隸書分成古隸和八分兩個階段。八分指的是結體方整、筆畫有明顯的波勢和挑法的隸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漢隸。八分形成以前的隸書就是古隸。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隸書顯然屬於古隸。

下邊主要根據“遣冊”，談談馬王堆一號漢墓隸書字體上的特點。



圖一 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竹筍簽牌





(一) 這批隸書的結體顯得很不方整。從筆法上看，“遣冊”的文字沒有八分的那種波勢和挑法(圖版 I · II)。竹筍簽牌上的文字，有的已經初步有了波勢和挑法(見圖一·1、2)，但基本上仍與“遣冊”的作風相同。


(二) 字形有相當一部分跟篆文還很接近。例如犬(圖版 I · 1)、元(圖版 I · 2)、衣(圖版 I · 3)、方(圖版 I · 4)，以及見於偏旁的宀(圖版 I · 4 沈字偏旁)、爪(圖版 I · 5“菜”字偏旁)等字，跟篆文幾乎沒有多大區別。又如文(圖版 I · 6)、高(圖版 I · 5)、享(圖版 I · 9“郭”字偏旁)、六(圖版 I · 7)、木(圖版



^④ 1968年在中山靖王墓中發現漆盤及耳杯，上有銘文，記卅七年(《滿城漢墓發掘紀要》，《考古》1972年1期14頁)。中山靖王卅七年相當於武帝元狩五年。梅原末治《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著錄的最早一器為昭帝始元二年耳杯。




I·6、12)、牛(圖版 I·8、9)、生(圖版 I·12)、熏(圖版 I·13)等字上端的寫法,也都還保持篆文的特點。



(三)一方面存在着很多接近篆文的寫法,另一方面又已經出現了不少草書式的寫法。








在“遺冊”裏,偏旁“止”絕大多數寫作,例如定(圖版 I·10)、足(圖版 I·9)、筥(圖版 I·14)等字。“辵”字所从的“止”進一步簡化為,例如逢字(圖版 I·16)。草書的“止”旁有、等寫法,^⑤與此相似。

偏旁“皿”中間偏右的豎劃往往與底劃連成一筆,例如蓋、盛、盪(以上皆見圖版 I·11)等字。草書“皿”旁多作,顯然是由此進一步簡化而成的。

偏旁“工”的中豎或者與下面的橫劃連為一筆,例如左(圖版 I·9)、徑(圖版 I·7)、脛(圖版 I·15)等字;或者與上下橫劃併連為一筆,例如空(圖版 I·17)。草書“左”字作或,“工”旁寫法與此相似。

“綺”字所从的“可”有時寫作 (圖版 I·3)。草書“可”字作或,與此相似。

“扶”字所从的“夫”寫作 (圖版 I·18),如果再寫得草一點,就成為草書的了。

(四)文字形體很不統一,同一個字或偏旁往往有不同的寫法。例如“大”字就有兩種寫法(圖版 I·13; II·19)。“童”、“種”所从的“童”多作 (圖版 II·20),但偶爾也作 (圖版 II·21)。“木”字及“木”旁多作、,但有時也作 (圖版 II·19“枚”字偏旁)、 (圖版 I·5“菜”字偏旁)。“口”旁主要有兩種寫法(圖版 II·22“合”字偏旁; II·23“器”字偏旁);如遇“口”上偏旁中間有豎劃,還經常把“口”旁的左豎劃跟它合併為一筆,例如周(圖版 II·24)、苦(圖版 II·25)等字。“皿”旁往往用草體,但用正體的也相當多(圖版 II·26“蓋”、“盛”二字偏旁)。“疏”字所从的“疋”(古代疋足二形多不別),有的作,有










⑤ 本文所引草書,凡不注明出處者,皆據葉夢得本章草急就章(即松江石刻本),《吉石庵叢書》三集有影印本。

⑥ 《流》卷二烽燧類 2 背。背係草書。

⑦ 此“左”字據宋克書急就章(文物出版社影印本),松江本“左”字下劃與上不連。

⑧ 《流》卷三·21。係草書簡。

⑨ 此字為松江本“何”字偏旁,宋克本“可”字寫法同(“可”字在松江本闕文中)。

的作 (圖版 II · 28)；“𠂔”字所从的“足”，“遣册”作 (圖版 II · 29)，竹筍簽牌作 (圖一 · 3)；“止”旁或作草體，或作正體。“遣册”竹頭作 (圖版 I · 6、8 等)，竹筍簽牌竹頭則有 (圖一 · 2、5)、 (圖一 · 3、4) 兩種寫法。“遣册”艸頭作 (圖版 I · 5、17；II · 39 等)，竹筍簽牌艸頭則作 (圖一 · 5)。在較晚的隸書裏，竹頭艸頭往往相混。從簽牌竹頭可以寫作 來看，艸頭在當時很可能也已經有這種寫法了。

文字形體不統一的現象，在隸書裏始終存在。但是，像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隸書那樣，在同時書寫的一批文字裏，就存在這樣多不統一的寫法的現象，在後來的隸書裏是很難看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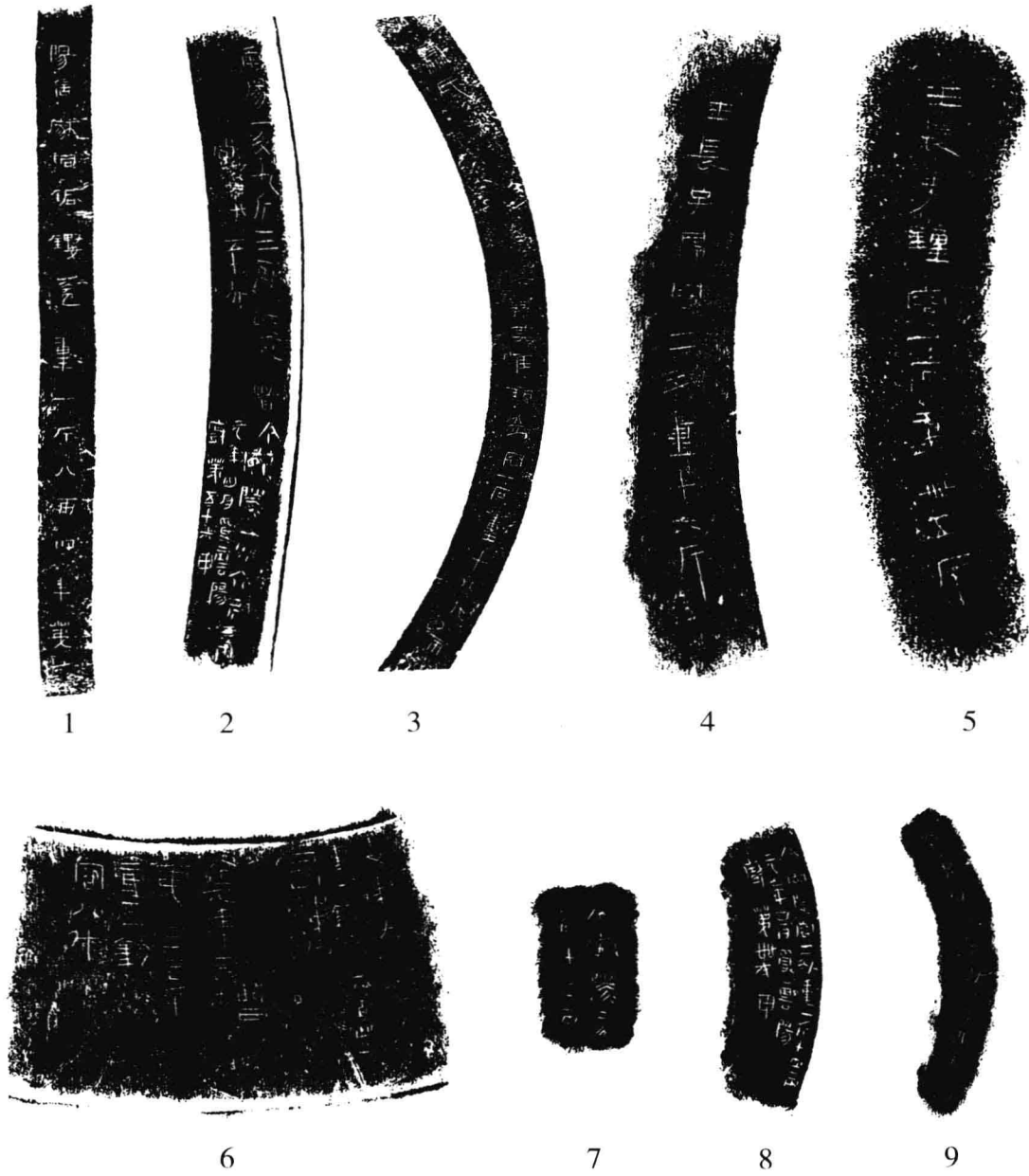
以上所說的四點，都反映出這種隸書的不成熟和不穩定。它顯然正處在相當劇烈的變化過程中。馬衡在考釋居延簡中的元帝永光二年文書時，評論簡文字體說：“蓋西漢文字變化，故一篇之中兼有篆、隸、草也。”^⑩其實永元二年文書已經是相當成熟的隸書，不過馬氏的話用來評論馬王堆“遣册”的隸書，那倒是很確切的。

馬王堆“遣册”所代表的古隸，在當時應該是很通行的一種字體。

在已著錄的漢代銅器銘文裏，就可以看到不少跟“遣册”很相似的隸書。例如陽信家鉅鏤(圖二 · 1)、魏其侯盆(圖二 · 3)、王長子鼎(圖二 · 4)、王長子鍾(圖二 · 5)、昆陽乘輿鼎(見《考古》1963 年 2 期 67 頁圖)等銘，以及雲陽鼎(圖二 · 2)和安陵鼎蓋(圖二 · 7—9)上以“今安陵”開頭的那幾段銘文，字體的作風就顯然跟“遣册”很相似。

在文字的具體寫法上，它們之間也有不少相似之處。雲陽鼎和安陵鼎蓋的“第”字艸頭與“遣册”艸頭相同，“元”字的寫法也與“遣册”接近。陽信家鉅鏤的“蓋”字“皿”旁，與“遣册”“皿”旁草體相似。鉅鏤“信”字和“遣册”“信”字的“言”旁(圖版 II · 30)，都保存着“言”字所从的“辛”旁的中劃。王長子鍾“鐘”字所从的“童”，與“遣册”“撞”、“種”二字所从的“童”相似。昆陽乘輿鼎“佐”字所从的“左”，“工”旁寫法與“遣册”相似。昆陽乘輿鼎和王長子鼎的“六”字，都與“遣册”相似。陽信家鉅鏤、魏其侯銅盆、昆陽乘輿鼎、王長子鼎、王長子鍾以及安陵鼎蓋的“重”字，全都保留篆文“重”字从“東”的遺意，也是與“遣册”“童”旁的寫法一致的(篆文“童”也从“東”)。

^⑩ 《居延漢簡考釋兩種》，《考古通訊》1957 年 1 期 108 頁。該文書見《居甲》2553。



圖二 銅器銘文拓本(取自容庚《漢金文錄》)

- 1. 陽信家鈺鏤(《漢》4·8上)
- 2. 雲陽鼎(《漢》1·7上)
- 3. 魏其侯盆(《漢》4·5上)
- 4. 王長子鼎(《漢》1·18上)
- 5. 王長子鍾(《漢》2·16上)
- 6. 右槽鍾(《漢》2·5下)
- 7-9. 安陵鼎蓋(《漢》1·7下)

除以上諸器外，如右槽鍾（圖二·6）、女陰侯鼎、^⑪美陽鼎、^⑫廣陽鼎蓋、^⑬輦車宮鼎、^⑭陽周倉鼎^⑮等器的銘文，也都與“遺冊”比較接近。

從字體上看，上述這些銅器都應該是西漢前期的東西。這些銅器有不少是紀年的，但都沒有年號。如雲陽鼎和安陵鼎蓋記元年，昆陽乘輿鼎記三年，陽信家鉅鏤記四年，女陰侯鼎記六年，右槽鍾有二銘，一記十五年，一記今元年。這正符合西漢前期沒有年號的特點。^⑯

有的銅器還能考出比較確切的年代。例如陽信侯劉揭封於文帝元年，傅子中意，於景帝六年有罪免。^⑰可知陽信家鉅鏤的時代不會早於文帝四年，也不會晚於景帝四年。西漢一代，一次紀元超過十二年的只有文帝。可知右槽鍾的十五年必為文帝十五年，鍾上另一銘的今元年可能是文帝後元年。馬王堆一號漢墓的時代大概也不出文景兩代。

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座漢墓裏發現了大批竹簡，內容為《孫子兵法》等古書。據發掘者估計，墓葬年代最晚不會晚於武帝初年。這批重要的漢簡目前正在整理中。根據初步觀察所得的印象，大部分簡文的字體也與馬王堆一號漢

⑪ 《漢金文錄》（在《秦漢金文錄》中，以下簡稱“漢”）1·9下。

⑫ 同⑪，1·22上。

⑬ 同⑪，1·19下。

⑭ 同⑪，1·21下。

⑮ 同⑪，1·28下。

⑯ 陳直《古器物文字叢考》認為昆陽乘輿鼎是武帝末期物。他說：“三年之上不記年號，應屬於武帝末期之紀年。桂宮行鐙題二年少府造，與此體例正同。《三輔黃圖》記桂宮武帝太初四年秋造，從前對漢器不記年號者，皆指為武帝未有紀年（引者按：宜作“年號”）以前之物，據此可以知其不然。”（《考古》1963年2期81頁）今按，昆陽乘輿鼎從字體上看為西漢有年號以前之物無疑，最晚不能晚於武帝初期。（武帝前期在當時亦無年號，建元至元鼎年號皆後來追加。觀《史記·封禪書》自明，前人多已言之。《漢金文錄》、《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等書所著錄漢器中記元朔、元狩、元鼎年號諸器，皆為偽作，字體卑弱，與武帝時真器迥然有別。又所謂建元弩機，建元乃建光之誤釋。《漢》2·5上之中私府鍾記“四元七年正月甲寅”疑四元即相當於元狩，器為元鼎元年未改元〔指無年號之改元〕時作，元鼎元年正月癸卯朔，甲寅為十二日。《封禪書》以元狩為三元，未數元朔，似誤。）陳文所舉桂宮行鐙之二年，應為武帝後元二年。武帝後期已立年號，但最後二年無年號，後元之稱為後來所加。居延簡中，後元二年亦止稱二年（看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考古學報》1965年2期108頁）。此係武帝最後兩年之特殊情況，並不能說明武帝後期銘文有不用年號之習慣。

⑰ 據《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表又有陽信胡侯呂青，陽信當從《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作新陽。哀帝時鄭業亦封陽信侯（《外戚恩澤表》作陽新），與陽信家鉅鏤之時代顯然不合。